

艱苦的歷程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



艱苦的歷程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

(上)

人 民 出 版 社

封扉题字：徐向前

封面设计：倪天煦

艰 苦 的 历 程

JIANKU DE LICHENG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革命回忆录选辑

上 册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6.5印张 366,000字

1985年2月第1版 198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43,000

书号 11001·739 定价 2.55元

目 录

1	序言	李先念
6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	徐向前
19	徐向前同志在红四方面军	徐深吉
49	大别山红旗永飘扬	陈再道
61	黄麻起义前后	戴季英
80	潘忠汝血染黄安城	吴世安
85	战斗在木兰山	程启光
92	柴山保武装割据	陈再道
99	商南起义	王玉田

111	124	130	138	150	158	170	178	187	193	200	207	215	224	238	253
六霍起义· · · · · · 蒋全忻	从童子团到红军战士· · · · · · 王政柱	徐师长批准我当红军· · · · · · 游正刚	英勇善战的红一师· · · · · · 杜义德	红一军第一次会合· · · · · · 王宏坤	红十五军在鄂东南· · · · · · 陈金钰	第三次打新集· · · · · · 郑国仲	澧水之战——回忆双桥镇战斗· · · · · · 徐深吉	夜袭宝山寨· · · · · · 潘炎	怀念许继慎同志· · · · · · 漆远溇	怀念哥哥戴克敏· · · · · · 戴觉敏	怀念周维炯师长· · · · · · 林彬	缅怀肖方同志· · · · · · 张贤约	黄安大捷· · · · · · 秦基伟	苏家埠战役· · · · · · 徐深吉	苏家埠战役散记· · · · · · 詹才芳

川陕革命根据地略图

316 西征路线示意图

地图插页： 50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略图

425	「夜老虎」团吃掉「王老虎旅」	516
	「夜老虎」团	511
	妇女运输连	506
	关公场的战斗	500
	记红四方面军反六路围攻的斗争	489
	奇袭青龙观	480
	万源保卫战	470
	回忆反六路围攻	444
	怀念汪烈山师长	437
	从游击队员到红军战士	431
	——回忆王维舟同志	
	「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425
		郑维山
		林彬
		王泽南
		丁武选
		李德生
		陈金钰
		许世友
		张才千
		陈锡联
		李平三
		贺长清

序 言

李先念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艰苦的历程》，将要出版了。编者希望我为这部书写一篇序言。很多老同志都可以为这部书作序。既然编者要我来写，盛情难却。红四方面军的历史，距今有半个世纪，许多事情记不起来了，我把想到的简要地写出来，作为序言吧。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有三大主力，就是第一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和兄弟部队一样，是一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部队。在十年内战时期，它英勇转战于湖北、河南、安徽、陕西、四川、西康、青海、甘肃、宁夏、新疆等地，先后开辟了鄂豫皖和川陕两个革命根据地；它打了许多著名的大仗，在多次反“围剿”战争中，共歼灭敌人几十万，创造了许多光辉的战例；它在激烈的阶级搏

斗中，为我党我军培养造就了大批领导骨干，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在胜利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后，它和红一、二方面军、陕北红军等兄弟部队汇集在一起，融合成一个整体，经过一九三七年八月关中改编，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又担负起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挽救民族危亡的重任。红四方面军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在党的历史上，在军队的历史上，都写下了重要的篇章。研究和总结它的历史经验，对我军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发扬光荣革命传统，进一步提高军事和政治素质，增强军队的团结和军政军民的团结，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九二七年，当中国革命处在危机的时候，我们党召开了“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在这前后，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地方的起义，开始了红军的初创时期。黄麻起义是秋收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董必武等同志领导的湖北党组织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发动的一次著名起义。红四方面军的创建就是从此开始的。黄麻起义，首先创建了红三十一师，商（城）南起义和六（安）霍（山）起义，又相继建立了红三十二师、红三十三师。这三个师组成红一军后，同活动在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红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红四军和新成立的红二十五军，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组成了红四方面军，进一步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鄂豫皖地区打开了新的局面。红四方面军战斗的地区处在国民党统治的咽喉，东临津浦路，西扼京汉路，北危陇海路，南迫长江，逼近武汉，震动南京，严重地威胁着蒋家王朝的统治，成为敌人投入大量兵力反复“围攻”的一个主要目标。一九三二年底，红四方面军主力转战到川陕地区后，

又把活动在川东的游击军和其他地方武装力量扩编进来，形成了一支拥有八万人的强大力量。这对于抗击川、陕、甘的敌人，支持和掩护红一、二方面军的长征，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四方面军经过长征转战到甘肃的会宁后，一部分在陕甘地区作战；一部分奉命渡过黄河，尔后组成西路军，在河西走廊艰苦奋战半年多，余部转到了新疆。留在鄂豫皖地区坚持斗争的红二十五军，后来一部分于一九三五年九月长征到达陕北，同陕北红军会合；一部分成为陕南游击队；一部分重新建成红二十八军，一直在鄂豫皖坚持游击战争，成为坚持在南方八省游击战争的一支重要力量。抗日战争爆发后，以它为主力改编为新四军的第四支队，开赴皖西后改为第二师；留守在七里坪的部分，又发展成新四军第五师的一支劲旅。红四方面军的十年战斗历史，是处在我党创建人民军队最艰难的时期。它的诞生和发展，经历了极其错综复杂的过程。战斗在各个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不论上面提到的，还是没有提到的，都在创建人民军队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的斗争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中国工农红军长期处在国民党军队的分割和包围之中，他们在不同的地区作战，互相配合，互相支援。红四方面军虽然有很长一段时间处在独立作战区域，没有和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在一起，但是它的成长壮大是同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分不开的。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状况出发，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并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名文

章。“八七会议”后，他回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又率领部队在井冈山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先后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许多光辉著作。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为中国革命运动奠定了正确的理论基础，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发展的正确道路，指导全党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一九二八年冬，鄂东特委就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和实践代表了我们的正确方向，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同志的领导下，就是沿着这个方向成长起来的。

我们党领导的武装斗争的道路，是胜利的道路。当然，也经历了许多曲折，红四方面军经历的曲折可以说更多一些。由于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特别是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党、分裂红军的罪恶活动，不仅给中国革命事业和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造成了严重危害，而且使红四方面军屡历险境，迭遭危难，付出了重大代价。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并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清算了他的错误和罪恶，使自己锻炼得更加坚强，更能自觉地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从来就把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同张国焘严格区分开来，明确指出：四方面军的干部是党的干部，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干部，并充分肯定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艰苦奋斗，不畏险阻，英勇善战，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忠诚于革命事业的崇高精神和优良作风。因此，张国焘的错误和罪恶，丝毫不损于红四方面军的历史功绩。

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来自五湖四海，主要是贫苦农民，还有工人、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有中央派来的负责干部，又有在战争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大批地方干部。他们在党的领

导下，紧紧地依靠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并和人民群众一起，朝着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团结一致，舍生忘死，浴血奋战，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特别是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值得我们永远怀念和歌颂。

相信广大读者，会从这部革命回忆录中吸取精神力量，以革命前辈为榜样，激励自己，坚决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一九八四年五月于北京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

徐向前

作风就是战斗力。一个革命政党，要有好的党风，才能团结群众，实现自己的纲领、路线。同样地，一支革命军队，也必须具有好的战斗作风，才能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是在党的领导下从长期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战斗作风好，打仗过得硬，是这支军队的特点和优点之一，也是它能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想把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概括为五个字：狠，硬，快，猛，活。

首先是狠。

这个“狠”字，是首要的、根本性的东西，贯穿于红四方面军的全部战斗活动中，不论打小仗或打大仗，游击战或运动战，进攻或防御，正

面突击或迂回包围，分散袭敌、扰敌或集中主力歼敌，内线转战或外线出击，一言以蔽之，部队从上到下，自始至终，都有一股狠劲：有敌无我，有我无敌，不消灭敌人，决不甘休。

那时，部队作战一不为钱，二不为官，一心一意要消灭敌人。指战员不是怕打仗而是盼打仗，巴不得天天有仗打，天天捉俘虏、缴武器弹药。如果一两个月不和敌人交锋，下面急得象开锅似的，意见一大堆，领导上要做许多思想工作。相反，战斗任务一下达，几乎用不着费唇舌，下面就忙活起来，人人生龙活虎，个个摩拳擦掌，把枪支、子弹、草鞋、干粮袋弄得好好的，随时准备投入战斗。

谁都知道，战争不是儿戏，而是敌我双方的生死搏斗。打仗，不仅要吃大苦，耐大劳，而且要流血，要死人。战役战斗的准备和进展过程中，连续行军，连续作战，顶酷暑，冒严寒，喝不上水，吃不上饭，几天几夜睡不上觉，是家常便饭。每个战役战斗的胜利，我们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人甚至上千人的伤亡。然而，部队硬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了彻底消灭敌人，解放受苦受难的工农大众，什么饥寒呀，苦累呀，危险呀，伤病呀，流血牺牲呀，通通不在话下。“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不消灭敌人，不是英勇的红四方面军！”是广大指战员的响亮战斗口号。只要枪声一响，指挥员把驳壳枪一举，喊声：“同志们，跟我来！”战士们就奋不顾身，前仆后继，扑向敌人，直至将敌人摧垮和消灭。大家把在战场上的英勇牺牲叫做“革命到底”，认为这是一个红军指战员的神圣归宿，因而也是最大的光荣。

部队有了这么股狠劲，从而形成了近战歼敌的优良传统。当时，敌众我寡，敌优我劣，敌强我弱。不仅战略上如此，且战役战

斗中也往往如此。每次敌人“会剿”、“围剿”的兵力，均数倍、十数倍于我。敌人有飞机、大炮、自动火器和充足的弹药，我们没有。我们只有步枪、撇把子、大刀和马尾手榴弹；从敌人手里缴来些迫击炮和轻重机枪，但缺乏弹药，坏了又无法修理。在这种条件下，我军靠什么去战胜敌人呢？主要就是靠士气，靠勇敢，靠有股非消灭敌人不可的狠劲，靠短兵相接，刺刀见红，手榴弹开花。这就是近战。或攻或防，或迂回或突击，不接近敌人不打，五百米不打，三百米不打，二百米不打，单等几十米以内再打。一锤子下去，敌人倒下一大片，惊慌失措，锐气顿挫。这样，才能有效发挥我军的优势，减杀敌人的优势，迅速克敌制胜。红四方面军历次战役战斗的胜利，充分证明了近战手段的强大威力。我们的火力火器不行，远远落后于敌人，如果又不实行近战歼敌，所谓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争取胜利，便是空谈。而要近战歼敌，杀出部队的威风来，关键在于一个“狠”字。两军对垒，势不两立，你死我活，必须“狠”字当头，力争多多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是保存自己的最基本的手段。“宋襄之仁”和“菩萨心肠”乃自取灭亡之道，为我军所鄙弃。只有对于放下武器的敌人，我们才施以“仁政”，宽大处理。

狠的战斗作风，建立在红军指战员高度阶级觉悟的基础之上。没有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敌人的无比憎恨，没有远大的革命理想和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打仗是狠不起来的。在这里，经常的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起着主导作用，它是培养这种战斗作风的基础一环。

第二是硬。

部队作战，不但要狠，而且要硬。程咬金的三斧头，狠是狠，但砍完就“撒气马”。没有后劲，过不得硬，是不行的。尤其在战

役战斗的严重、惨烈、危急时刻，部队一定要有“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气概，真正拿得出，挺得住，过得硬。这股硬劲，有时能起到反败为胜，化险为夷，扭转整个战局的重大作用。红四方面军历经许多艰险危险的严峻考验，树立了过硬的战斗作风。

我们的胜利，确确实实来之不易。一部红四方面军成长壮大的历史，就是不断同敌人打硬仗、恶仗，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的历史。那个时候，我们叫做“硬着头皮打”。

事实证明，我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作战，虽然主要采取“避强击弱”的作战方针，但打的却多是硬仗、恶仗，轻而易举取胜的战例是不大多见的。这是因为：（一）根据地范围有限，又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敌人的“会剿”、“围剿”，一次比一次规模大，时间久；投入的精锐部队，也一次比一次众多。红军回旋余地不大，要想完全避免同强敌、众敌作战，几乎是不可能的。（二）敌我力量的悬殊，使红军的劣势地位短期之内无法改变，因而即便是敌人的弱军（与其强军相对而言）同我们作战，也往往有恃无恐，其嚣张气焰和拚死决斗的程度，相当可观。国民党正规军如此，杂牌军如此，反动民团也如此。同我作战的敌军，几乎没有成建制倒戈的事件发生；我拔掉某些根据地边缘地带的反动民团寨子，也不容易，原因就在这里。（三）虽然各路敌军“围剿”根据地时，互存戒心，各保实力，给我以可乘之隙，但在对付红军这一点上，他们毕竟有共同的利害关系。我拣某一点或某一路弱敌去打，有时会遇到他路敌人迅速来援的情况。我军必须连续作战，进而打破援敌的包围和夹击。“围点打援”时，援敌来势凶猛，人数众多，要吞掉他们，更是需要花费力气的事。（四）特别在我军反“围剿”失利被迫转战的情况下，敌人疯狂围追堵截，有些敌我力量悬殊的艰险战斗，避也避不开，非打不可。

所以说，我们那时打的许多仗，的确是硬着头皮干的。形势所迫，斗争需要，不这样干怎么行呢！如果部队只想拣省劲的仗打，一见到硬敌、众敌就望而生畏，远走高飞，不敢抓住战机，尽一切可能去夺取胜利，那就势必走向消极避战和逃跑主义。要打破“围剿”和壮大红军是不可能的，想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当然也是不可能的。

每个战役战斗，无不都是敌我双方的拚力竞赛。谁胜谁负，除了主观指导正确与否、战术运用恰当与否等条件外，部队能不能在节骨眼上过得硬，熬得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我们在敌众我寡或敌我力量大体均衡的条件下进行战役战斗，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形：关系双方主动地位的一个口子的突破，一个制高点的夺取，一个防御阵地的固守，要经过反复多次的、剧烈而残酷的冲杀和拚搏。这是叫劲的时刻。谁能咬紧牙关，压倒对方，谁就会取得先机之利，推动战局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另一种情形是，由于战场形势千变万化、敌我力量悬殊或我方出现某种失误等原因，部队突然面临攸关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例如，黄安战役“围点打援”时，我嶂山阵地被援敌突进，危及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安全，使战局面临逆转的极大危险；漫川关战斗中，我军遭敌重兵包围在深山峡谷地带，险遭全军覆灭的命运。在这种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部队顶得住，冲得出，结果转危为安；否则，将不堪设想。再一种情形则是敌我双方旗鼓相当，鏖战到精疲力尽的地步，看来几乎已无战胜对方的希望。然而，这也正是需要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时刻。坚持下来的就容易取胜，反之则功亏一篑，甚至招致完全失败的结局。我们当时强调部队在鏖战的最后关头，一定要有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毅力，以便把敌人熬垮，趁势歼灭之。假如失去了这种机